

毛泽东与古田会议

韩荣璋 陈朝响 陈立旭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与古田会议

韩荣璋 陈朝响 陈立旭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年 · 福州

闽新登字01号

毛泽东与古田会议

MAO ZEDONG YU GUTIAN HUIYI

韩荣璋 陈朝响 陈立旭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5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闽侯青圃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6.125印张 4插页 144千字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211—02194—2

D·158 定价: 5.90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

武装斗争的开始..... (8)

一、党在初创时期的军事工
作.....(8)

二、开创独立领导武装斗争
的新时期.....(17)

三、朱毛会师，红四军成立...(25)

第二章 为了建设一支新型的

人民军队..... (30)

一、一个崭新的课题.....(30)

二、“六大”前后党中央的
探索.....(34)

三、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的
理论与实践.....(42)

四、站在新的高度.....(50)

第三章 朱毛红军的一场争论	
.....	(55)
一、问题的提起.....	(55)
二、争论的主要问题.....	(63)
三、军委问题成为焦点.....	(72)
第四章 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	
表大会.....	(78)
一、红四军“七大”的召开.....	(78)
二、红四军“七大”决议.....	(80)
三、红四军“七大”选举的	
新前委.....	(84)
四、对红四军“七大”的评	
价.....	(86)
第五章 红四军出击闽中、进	
军东江.....	(89)
一、红四军“七大”召开期	
间的国内形势.....	(89)
二、红四军出击闽中.....	(92)
三、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	
大会.....	(100)
四、红四军进军东江.....	(104)
第六章 中央九月来信.....	(113)
一、中央对红四军的八月指	
示.....	(113)
二、中央九月来信.....	(116)
三、毛泽东返回红四军前委.....	(127)

第七章 古田会议……………(130)

一、会议召开的条件……………(130)

二、会前准备……………(132)

三、古田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135)

四、毛泽东建军思想形成的标志……………(142)

第八章 古田会议精神在全军贯彻……………(144)

一、敌第二次“三省会剿”的失败……………(144)

二、红四军贯彻古田会议决议……………(147)

三、向全军推广红四军建军经验……………(163)

第九章 毛泽东建军思想成为全军的指导思想……………(172)

一、纠正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172)

二、王明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76)

三、伟大的历史转折……………(187)

绪 论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璀璨夺目的瑰宝，毛泽东建军思想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建军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武装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理论。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929年末，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指导下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则是其形成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年代，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内无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外无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共产党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要领导人民进行翻身求解放的革命事业，只能经由武装斗争的道路。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在实践中开始了进行武装斗争的工作。在协助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组建国民革命军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取得了建军的初步经验，并培养出了自己的一批军事骨干。但此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彻底认识军队的重要性，还没有把直接掌握和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放在重要地位。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提高了中

国共产党人的认识，由此彻底懂得了直接掌握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极端必要。以南昌起义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在自己成长的道路上，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要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组建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而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产业工人极其稀少，构成红军的主要成份是农民，红军又长期处于农村的游击战争环境。在这样的国情条件下，如何建设起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呢？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年未曾遇到而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一个十分困难而又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党中央和党领导的各支红军，都结合自身对马克思主义建军原则的认识和武装斗争的实践，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其中，在已组建起来的十余支红军中，实力最强、革命影响最大的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走在了成功的探索者的最前列。他们在创建新型人民军队方面不同凡响的举措和不断总结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也日益得到了党中央的瞩目。在一定程度上，党中央把朱毛红军作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试验园地。

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一件意义深远的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其成长的道路却不总是平坦的。建军初期，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刻意把红四军建设成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不懈探索中，有着诸多的共识，并不断取得长足的进步。但在处理政治与军事、民主与集中等关系问题上，他们之间也一度存在过意见分歧，并为统一认识，共同推动部队的建设，在短短的半年中，接连召开过红四军党的七、八、九三次代表大会。

如何正确看待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探索建设新型人

民军队的过程中一度出现的意见分歧，如何正确评估红四军在此期间召开的有关建军的会议及与之相关连的军事行动，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当时的言行及在形成毛泽东建军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一些相互影响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早就应该作出明确回答的问题。然而，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这个问题的解决竟迟滞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迄今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新中国诞生前，学术界对毛泽东建军思想的研究刚刚起步，出版的论著中，多侧重提出和论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概念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还较少对建军思想具体内容作深入探讨，对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建军问题上一度出现的争论，则均未提及。在编选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论著中，除收入有代表性的毛泽东军事著作外，有时也收入朱德的军事著作。对朱德在毛泽东建军思想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持肯定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学术界对毛泽东建军思想的研究已逐步展开，涉及的内容也较前广阔。在对建军理论的研究中，受当时日益强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宣传导向的影响，也趋于强调两种军事思想、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对朱毛红军在建军问题上一度出现的争论，则多取回避态度。当时虽无明文规定不能研究，但在实际工作中却被视为“禁区”。在谈到这个问题或写这段历史时，一般均使用笼统的手法或一笔带过。在谈到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创建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功绩时，只是突出和强调毛泽东个人的贡献，对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作用则基本上没有论述。在这个阶段，朱德、陈毅等因为当年曾参加过红四军党内有关建军问题的争论，发表过与毛泽东相左的不成熟意见，而作过多次检讨。他们的检

查材料，被下发到一定范围，曾引起一些人认识上的混乱。由于发放的范围还限于党内一定领导机关，在学术界和群众中尚未造成太大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上掀起一股神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狂潮，动辄上纲上线，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点审视一切，以“三忠于、四无限”的标准衡量一切。在当时推出的为数不少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史》一类的小册子和众多的展览陈列中，已公开把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作为古田会议（“九大”）的对立物，把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后，在朱德等主持下出击闽中、进军东江的行动，列为“资产阶级”的军事行动，并不点名地把朱德、陈毅等当作这时期推行“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代表。这种情况，造成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上的困惑或混乱。对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正常研究工作已完全中断。

粉碎“四人帮”后，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在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引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不仅重又走上了科学的轨道，而且有了重大突破。大家普遍摆脱了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谱写历史的传统模式，明确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我們进行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作为一门严整的科学，它同时也是研究的对象；毛泽东思想不仅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关于革命、建设等问题的正确认识，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思想观念的更新，加上大量文献资料的公布和对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思想研究的开展，学术界又重新审视了朱毛红军时期的这段公案。在新的起点上，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与古田会议的关系，红四军出击闽中、进军东江的两次军事行动和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发表了许

多别开生面、不同于以往的新见解。在这新一轮的研讨中，大家对朱毛红军一度发生争论的性质和出击闽中、进军东江的行动，在认识上虽仍有些歧异，但总的基调是向趋同的方向发展。学术界对朱毛红军一度产生争论的认识，经过多年的徘徊反复，终于走出误区，朝着真理的殿堂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论者限于著文时间的短促，或掌握资料尚不够齐全，大多只是从某个侧面谈自己的认识，还未能深入系统地说明这段历史，而在探求当时红四军党内在建军问题上一度产生争论的社会历史根源以及揭示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规律方面，仍显不足。

本书试图在这方面做一次尝试。不是全面书写这一时期党的历史，而是紧紧围绕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这条主线，以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为中心，并放眼全党全国，写出与建军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相关的人物、事件和学术界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希图在全面掌握确凿的文献资料基础上，以新的视角，着力阐明以下几点：

（一）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和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发展史、建军思想发展史的高度，说明毛泽东建军思想既根据于中国的国土和军事斗争实践，又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它成功地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它使毛泽东建军思想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无产阶级建军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结合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党从事武装斗争的革命实践活动，勾勒出毛泽东建军思想产生、形成的发展脉络，说明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共同探求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毛泽东发挥了最杰出的作用，周恩来、朱德、

陈毅、贺龙、彭德怀、邓小平等，也都为其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站在革命先辈齐心协力、共同探求建设起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高度，并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出发，揭示出当年朱毛红军在建军问题上，一度出现不同认识的深刻社会历史根源。指出这是前进中出现的一种正常的合乎情理的现象，对这场争论的性质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对这桩公案作出历史主义的评价；说明从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到古田会议期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探寻建军道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在这期间，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毅和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有关正确意见的指导下，经过比较充分的切磋讨论和艰苦有益的探索，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确立了建军的基本原则，在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形成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四)根据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结合党中央和福建省委的有关指示，以及红四军前委集体商定的意见，具体分析红四军出击闽中、进军东江的两次军事行动。指出这两次军事行动在粉碎敌人“会剿”，扩展革命影响，加强军队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澄清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并对其功过得失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本书的写作，不仅是试图客观、公正地说清这段历史，学习和总结朱毛红军时期建军的历史经验，而更是着眼现实，为着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军思想，推动新时期的军队建设。

今天和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时期已有很大的不同，客观形势和军队面临的任务，都发生了极大变化，毛泽东建军思想也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自身的内容。在这方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已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使我军的革

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跃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发展毛泽东建军思想与坚持毛泽东建军思想是辩证的统一，坚持是发展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建军思想并没有过时，其中许多重要的原则，如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健全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扬“三大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不仅仍然是我军加强军队建设的有力思想武器，而且在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商品大潮汹涌澎湃的形势下，更加显示出它的巨大威力。

让我们在正确总结和认识毛泽东建军思想形成的历史经验中，加深对毛泽东建军思想基本原则的理解，并把坚持毛泽东建军思想与学习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新发展结合起来，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健康的发展作出新的努力。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 武装斗争的开始

一、党在初创时期的军事工作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在文明古老的中国土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集中力量致力于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并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设立了分部。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在1年多的时间里，全国罢工达100多次，参加的人数达30万以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是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这次罢工中，京汉铁路全线工人统一行动，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但由于罢

工工人赤手空拳，又没有同盟军，因而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下，罢工遭到了失败，中国工人运动转入暂时的低潮。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锻炼了工人阶级的队伍，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扩大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吸取了血的教训：没有强大的同盟军，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就不能抗击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就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

“二七”惨案后，党采取了积极的步骤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建立工人阶级与其他民主力量的革命联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孙中山开始改组国民党的工作。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与我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基本一致的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了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为委员或候补委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改组后的国民党，开始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要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单枪匹马不行，有了革命的联盟，没有革命的武装也不行。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便开始了自己的军事活动。这个时期，党的第一项军事工作，是帮助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组建国民革命军，并在军校和革命军中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

国共合作前，孙中山并没有自己的军队。在军事方面，他只是依靠南方各省的军阀。而这些军阀则完全从自身利害出发，对孙中山时而拥护，时而反对，只是把孙中山视为可以利用的一个

旗号。他们本来并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对象。因此，在国共合作关系确立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即着手帮助孙中山进行建立革命武装、筹建军官学校的工作。

1924年5月，设立在广州黄埔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正式开学。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选派许多优秀干部到军校担任各级领导工作。周恩来、熊雄先后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任教官。为加强我党在军校的工作，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关于“要注意军官学校，至少要组织小的CP组织”^①的指示，于1924年秋在校内建立起秘密的中共黄埔特别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军事系统中建立的最早的基层组织，对开展党的工作，指导共产党员斗争，团结左派师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扩大党在军校的影响，保障军校学员的素质，党还专门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的组织选派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报考军校，指出“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②党从各地先后选送到军校学习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绝大多数都成了军校的骨干，其中很多人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指挥员。

在军校工作中，广大党的干部紧紧依靠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学习列宁创建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起一整套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设立党代表和建立政治部，目的是对师生进行政治工作，以革命的理论武装师生，培植师生的国民革命意识。1924年10月，以军校学生为核心，组成了军校教导团，首先在这里推行政治工作制度，稍后，又逐步推广到国民革命军各部队，成为区别于旧军阀部队的重要标志。黄埔军校建立的政治

①《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决议案》（1924年5月）。

②《中央第六十二号通告》（1925年11月）。

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开端，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已注意军事问题。“五四”运动前，他在天津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内组织了称为“军事研究团”的学术团体，并初步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是领导者不懂得“新旧不并立，冰炭不同炉”的道理，没有“直捣黄龙，剪除旧恶”。^① 旅欧期间，周恩来进一步认识到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使国家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明确提出进行武装斗争，开展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② 基于对武装斗争的深刻认识，周恩来当时在其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中，就设立了国内各级党组织中还没有的军事机构——军事部，并选派党团员去苏联学习军事。1924年9月，周恩来奉调回国，先后在中共广东区委担任委员长和军事部长，并在党同国民党合作组织的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工作。

在军事实践中，周恩来提出了依靠工农、联合商学各阶层组建革命军的主张，并以部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组建了铁甲车队，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运用苏联红军的组织原则和建军经验，就如何建设一支革命的军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初步提出了许多带有原则性的重要论断。

（一）关于军队的性质与任务。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批判了把军队视为阶级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它可以作为“压迫阶级的

①《中国现时之危机》（1916年11月）。

②《评胡适的“努力”》（1922年12月15日）。